

费孝通 论文化自觉

费宗惠 张荣华/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

论文化自觉

费宗惠 张荣华/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费宗惠,张荣华编,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204-09795-1

I. 费… II. ①费…②张… III. 文化学—文集 IV. 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224 号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

费宗惠 张荣华 编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占英 王继雄

封面设计 严 潇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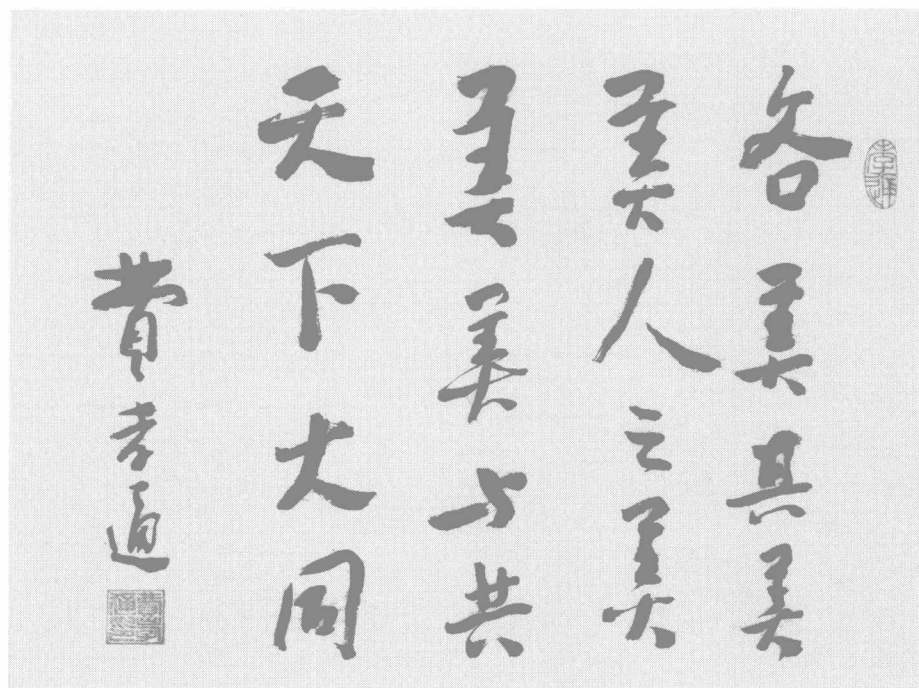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795-1/C·198

定 价 29.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费孝通在日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做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的演讲。会议结束时，他写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题词。

出版前言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亲历了20世纪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目睹了近百年来国内外风云变幻，矢志富民强国，从实求知，以自己的学术理论推进社会进步。从早年学术作品《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到晚年《行行重行行》等，无一不在思索传统中国社会与未来发展问题。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为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不同文明的交融与冲突渗透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两名美国学者的观点，成为西方思想界借以解释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常用的理论工具：一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二是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站在纵向历史传统与横向世界格局交汇点上，亦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费孝通先生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倡导的“文化自觉”。

费老明确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1997年1月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费老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

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老还认为，“文化自觉”并非固守以儒家为本的传统文化而力拒以普世价值为主的西方文明。他认为，传统与创造的结合极为关键，“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故此，“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则是费老对“文化自觉”历程的高度概括。这一思想是费老毕生从事文化研究和思考的升华，也是他寻求构建众美交融、和谐共处的人文价值理念的结晶，是中国学者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和研究“文化自觉”理论的萌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们特约请费老的女儿费宗惠，费老的女婿、秘书张荣华编了这本《费孝通论文化自觉》。本书在将费老有关“文化自觉”的著述尽量全部收录的同时，还收录了少量费老用这一思想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观察思考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的文章。如有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开创学术新风气	(1)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7)
人文价值再思考	(24)
完成“文化自觉”使命 创造现代中华文化	(44)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	(48)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56)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77)
关于文化交流	(84)
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	(89)
“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	(93)
新世纪 新问题 新挑战	(99)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112)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	(126)
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 的谈话	(139)
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157)
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	(171)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185)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197)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207)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论性的思考	(235)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253)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259)
个人·群体·社会	(276)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300)

开创学术新风气^①

首先谢谢北大领导给我在这次汇报会上一个旁听的机会。我所以来参加这个会，是一个感情问题，想看看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北大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长得怎么样了。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书名是《北大校长和中国文化》（三联书店出版），从京师大学堂的校长讲起，讲到了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很受感动。同时也想到了北大当前的定位问题。怎样去认识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文化任务。看来到这时候北大又要再开创一代学术的新风气了。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有如欧美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等，都在接触、在碰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形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的时代。这是北京大学应当能够开创一代新风气的时机。

开创什么新风气呢？我想用“文化自觉”四个字来表达。我意识到中国正走上了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四个现代化，开创出一个新的精神文明。北大应抓准这个机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就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各民族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怎样发展下去？人文

①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的讲话。

科学负有答复这一系列问题的重大责任。现在自然科学发展很快，人对人类本身生物学的研究已进入到了绘制基因图谱，科技研究的空间发展已从地球扩大到了太空。以人文科学来说，就要看我们如何跟上时代，认真地各自认识自己的文化了。

在中国开创学术风气，北大一直是带头的，五四时代北大出了个蔡元培。北大和清华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中，理应出现一个相适应的文化自觉，也就是认识文化的自觉行动。我感觉到这个风气不仅限于中国，而且正在许多先进国家中酝酿和展开。我们中国要抓住这个机遇，参与和推动这个学术的新风气。19 世纪在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人的自觉”，看来 21 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人类开始要求认识自己的文化了。

社会学是研究人在集体中的生活。社会人类学就是研究人在集体生活中所创制的文化。文化在哪里？就在集体生活的人的行为和意识中。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是有子有孙的，它靠一个个人在他们生活中表现、改变和发展着，日新不已。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当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中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我们需要懂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为什么不同，只有抓住了比较研究，才能谈得到自觉。以中国来说，开展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希望在北大。因为北大有这方面的传统，也有成就。现在要的是善于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一向在名片上不印任何公职，只写某某大学教授，这说明了我自己对于学术工作的重视和偏爱。大家知道我已辞去民盟主席的职务，明年人大副委员长的工作也到届了。如果我还能多活几年，我想用我一生中最后的那段时间继续做我的学术

工作。我想到了北大应当开创学术新风的问题，也愿意有机会参与。

去年在我家乡召开的学术活动 60 周年的欢聚会上，我发表了《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的论文。60 年后重温当年老师给我这篇论文出版时写的序言，我理解到他当时已看到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的几位人类学导师都教我直接去观察人的生活，从人的实际生活中去理解社会和文化。科学资料必须从实际中来。早期的人类学大多主张到异文化中去认识人如何生活。而我的论文却采用了从本乡人的生活去做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在人类学这门学科开了一个新风气，把这门学科推进了一步，就是把原来只研究所谓“野蛮人”的人类学推进到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乡“文明人”的生活。我当时还是刚刚踏进这门学科的年轻学生，并不是有意识地跨过这限制西方人类学发展的那条“文野之别”的门槛。所以我说这是我“无心插柳柳成荫”。60 年后重读老师的序言，才有豁然贯通之感，明白了马老师为什么说这本书是人类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他赞扬的是我开始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了。我把中国一个农村中农民如何生活、生产、分配的过程按我自己直接观察中得到的理解写了出来。这种研究本土文化的尝试，对这门学科来说，是前进了一步。

我们中国用文字来描述人们的生活方式早已有之。《红楼梦》是一个例子，可是它采取的是用小说来表达的方式，写出的是作家个人的体会。人类学却要在观察人的生活实践中，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系统地去表达人们的人文世界，也就是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去认识人的文化。所以我认为人类学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促进人的文化自觉。

人类依靠文化而得到生存和生活。文化是一个民族祖祖辈

辈积累下来经过不断改革的集体生活经验。我们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能离开自己从小学得的文化。正如《西游记》里的孙行者自以为本领大，翻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但终于发现翻来翻去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里。人同样跳不出文化，但人有智力可以认识它，有能力去改造它。人类学就是想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认识人类文化的学科。以中国来说，最先把人类学从西方介绍过来的就是早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

以我本人来说，60 多年前就在这未名湖畔接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当时在这里办学的燕京大学请来几位国外的访问学者。一位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大学学派的奠基人 R. Park 教授。他引导我们直接到北京市民的生活中去学习社会学。另一位是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 A. R. Radcliffe-Brown 教授，他鼓励我们下乡去实地调查中国农民。我有幸碰到当时开拓这两门学科的前沿学者。在他们影响下，我接受在燕京时的老师吴文藻先生提倡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社区研究”的方法；又由他介绍我去师从清华的史禄国教授和伦敦的 B. Malinowski 教授学人类学。在这条学术道路上我走了 60 多年，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通过我这 60 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使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 21 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

正因为我是个以研究社会和文化为职志的人文学科的学者，对当前人类的困惑特别敏感，对这种新形势所提出急迫的

问题特别感到严重。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还是忍不住要呼吁人文学科的同行们及时集中智力，首先在我们学术范围里开创这个适应当前局势的新风气，就是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也就是用实事求是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

这是件艰巨而伟大的工程，需要多种学科的努力。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共同从各自已有学术基础上向这个“文化自觉”的目标进军，合力形成一个新学风。在我们国内有这个条件的看来只有北京大学，所以我今天不愿放弃这个和北大领导会晤的机会，不自量力，提出这个“文化自觉”的设想，请予批评指正。

最后让我表示对各位校长的同情，我深知现在当校长很不容易，事务上的工作已使他成了一个公司的经理，天天忙着创收。怎样能把校长们解放出来，多多在学术本身的发展上打算打算，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多动动脑筋。校长的责任确实不小，不能辜负我们国家的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我衷心希望北大的校长们站出来，带头在学术上树立一个“文化自觉”的新风气。

言有不尽，不当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北大的各位领导同志。

以上是潘乃谷同志在汇报会上现场的记录稿，我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自己重读一遍，觉得对“文化自觉”这个概念还应加一些注释。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

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7年前在我 80 岁生日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的答谢词中，我瞻望人类学的前途时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1997 年 1 月 4 日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下面是根据我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多次发言的录音整理编成的记录。我历来不喜欢在讲课时照本宣读我已写出的讲稿，而喜欢随稿补充一些即席的思考，这也可名之为“讲课旁白”。

一

上届研讨班上我们大家约定：回去后都到田野去做一次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思考思考，过一段时间大家再聚在一起互相汇报心得。一年过去了，今天能在这里召开第二届研讨班，实现了这个约定，我感到十分高兴。同时李亦园教授主张，这样的研讨会不仅要有第二届，还要有第三届、第四届，每年召开一次，继续开下去，我十分赞成。在这里我也得表示一下决心，只要我还活着，不论哪一届，我一定参加。当然有一个前提，决定权不在我手上，要看老天还打算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再活多少年。我是属狗的，依传统算法，已经 88 岁了。俗话说：“八十不留宿”是指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到人家去做客，主人不愿再留我在他家过夜了，为的是谁也保不住第二天我是否还能起得来。我这样长的寿命，已超过了我的几位老师，包括吴文藻、潘光旦、史禄国、马林诺斯基。但在学术成就上实在无法相比，我对几位老师，只有惭愧二字可说。从《花蓝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的两次实地调查算起，到

去年已过了60年，老话是一个花甲了。如果不是在1980年我又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我这一生就留不下多少对后代也许还会有用的遗产了。也正是这种“岁月春水逝”的生命短促感，促使我这10多年来不停地“行行重行行”，力求此生能对得住祖祖辈辈的培育和期待。

最近这几年，我在外地跑得少了一些，原因不尽是由于年老力衰，而是因为我打算用这最后的一段生命，把自己一生中已经写下的东西多看看，结结账，写一套反思性质的文章，这不能不占去我一部分时间。我曾利用上一届的研讨班推出了我重读马老师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作为我在这个研讨班上的第一讲。同时我也为这届研讨会上的第二讲预定了内容，打算发表我对《江村经济》一书的反思。讲稿是写了出来，却花了有好几个月。今秋定稿时正好许多亲友建议利用我江村调查60周年的机会，大家到我家乡去欢叙一番，顺便去看看今天的江村。我就把那篇刚写好的文章送交《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印发，供大家讨论之用。

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决定召开这届研讨班时，又把这篇讲稿编入《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一书中，在讲课前分发给参加这届研讨班的学员们。一稿两用，不得已也。但因此大家能在听讲之前，看到这篇讲稿，思想上有些准备便于听得明白我这个南腔北调的口音。这篇讲稿题目是《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讲稿既然预先发给你们了，由你们自己去念好了。我将利用这两个小时，随心所欲地讲些有关这篇讲义的旁白。

这篇讲稿也是我正在写的一系列反思文章中的一篇，和在上一届研讨班上所讲的是相连续的。现在电视不是时兴连续剧么？我写连续性的文章，固然有点赶时髦的味道，其实这也是我在抗战时期养成的习惯。《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等都

是先写连续性的文章，然后合编成的。我这一系列反思文章刚开始，打算还要写下去。我这样说不是又在作预约，而是想说，各位最好把我的那几篇反思文章连起来念，一个人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前后有个继承性、连贯性，不掌握其中的思路，也就难于理解作者想在所写的文章中表达的论点。

我今天提供大家的那篇讲稿，不仅是想为我写的那本《江村经济》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定个位，而且也想借此说明这篇序言的作者，马老师，对这门学科发展上的贡献。我想把我今天的讲稿和60年前开始动笔的那本《江村经济》和马老师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三者连结起来，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门学科发展的一段经过。用以引出人类学在当前的处境和可能出现的新突破。

我在这篇讲稿里一开始就声明，我这本《江村经济》是一棵我无心插下的杨柳。马老师在序言里对它的评语，我当时不仅没有预料到，甚至没有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在江村调查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用此把人类学这门学科推进一步。当时我还是个初入门的年轻小伙子，既没有这眼光，也没有这雄心，甚至我在江村调查时并没有想到会写成一本书。我是在我姊姊的好意安排下到江村去养伤的。从插在这本书里的相片上还可以看出我当时扶着手杖，病容满面，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我是凭着从当时留我寄宿的农民合作丝厂给我的深刻印象和启发中想为这“工业下乡”的苗子留下一点记录而开始做江村调查的。

这棵无心插下的树苗，得到了泥土和雨水的滋养居然成活并长大了。论文写成，又印成了书出版，马老师还为它写了序。序里写些什么，我只是在伦敦回国前从出版这本书的书局送来该书的校样上粗粗地看了一遍，说实话印象并不深。当时占着我心头的是国内抗日战争。我记得船过印度停泊时才知道